

《黄帝内经》《素问》 《灵枢》诸书名的文化内涵

● 李磊* 尤传香*

摘要 本文分析探讨了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的书名涵义,认为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的命名都明显受到了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。《黄帝内经》的命名与形成于战国时期的黄老之学有关,《素问》的命名则受到了汉代确立的宇宙生成论的影响,而《灵枢》的书名更具有道家意味,体现了《黄帝内经》成书于秦汉之际并且与汉代盛行的黄老之学密切相关的学术特征。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诸书的命名显著表明了传统中医药的文化内涵。

关键词 《黄帝内经》 《素问》 《灵枢》

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从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诸书的命名中亦可以明显看出传统中医药的文化内涵。

1 《黄帝内经》

《黄帝内经》假托黄帝以名书,后世多以为是崇古风气使然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中说:“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,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、黄帝而后能入说。”

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,与伏羲、女娲、神农、祝融等同是华夏民族的远祖,其事迹已难以稽考。立言成书而称名黄帝,以示渊源有自,这明显是古人的假托。然而,在古代文献中,不仅有“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,典主医药,今经方、本草之书咸出焉”(皇甫谧《帝王本纪》)之类的传说,亦有着许多伏羲、神农创造发明医药的记载,如

“伏羲……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,以拯夭枉焉”(皇甫谧《帝王本纪》)、“神农……尝百草之滋味,水泉之甘苦,令民知所避就。当此之时,一日而遇七十毒,由是医方兴焉”(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)等等。对于《黄帝内经》为什么只是托名黄帝,而不是托名伏羲、神农等其它古代中的传说人物,用崇古假托的解释似乎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。

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,诸子略、兵书略、数术略和方技略中托名黄帝的著作约有近20种,例如道家有《黄帝四经》,阴阳家有《黄帝泰素》,小说家有《黄帝说》,天文家有《黄帝杂子气》,历谱家有《黄帝五家历》,五行家有《黄帝阴阳》、《黄帝诸子论阴阳》,医经有《黄帝内经》,经方有《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》、《神农黄帝食禁》,神仙家有《黄帝杂子步引》、《黄帝岐伯按摩》等等。这些著作除了《黄

帝内经》尚存外,其余均已亡佚。

就事理来说,上述以“黄帝”为书名的著作决不可能是黄帝所作,但是“黄帝”诸书的命名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从班固把《黄帝四经》、《黄帝铭》、《黄帝君臣》和《杂黄帝》等四种不同内容的著作归于道家类来看,黄帝之书多与道家有关;更确切的说,以黄帝命名的著作都应该与形成于战国时期的黄老之学有关。

黄老之学起源于战国而盛行于汉初,假托黄帝之名而立言,以老子之学为主,因此属于道家。王充《论衡·自然》中解释说:“黄者,黄帝也;老者,老子也。”在政治上,黄老之学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,并融合了儒家的礼义仁爱思想、法家的法治思想、名家的形名思想、阴阳家的天人相参思想等等,强调“贵清静而民自定”,适应了汉初因战乱后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的社会需要。《史记·曹相国世家》中说曹参“其治要用黄老术,故相齐九年,齐国安集,大称贤相”,

* 作者简介 李磊,男,医学博士,助理教授。尤传香,女,中医(针灸学)硕士,讲师。

• 作者单位 1.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;2.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

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中说陈平少时“治黄帝老子之书”，《史记·外戚列传》中说“窦太后好黄帝老子之言，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《老子》，尊其术”，刘向说：“文帝本修黄老之言，不甚好儒术，其治尚清静无为”（《风俗通义·正失》），《史记·乐毅列传》中说“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”，《史记·汲黯列传》中说汲黯“学黄老之言”、“治官理民，好清静”，《史记·袁盎晁错列传》中说邓章“以修黄老言，显于诸公间”，这些记载都表明在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前，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甚为流行，并且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和尊崇。

黄老之学将黄老并称，黄帝也成为道家的人物。《黄帝内经》依托黄帝以名书，而不是托名伏羲或神农，自然与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有着密切关系。黄老之学兼采诸子，既继承了道家的思想，又吸取儒家、名家、法家、墨家、阴阳家等各家之长，实质上是综合性的道家学派。《黄帝内经》中广泛使用的“道”的概念、事物运动变化的辩证观点以及天人关系、阴阳学说、精气学说、形神关系、清静寡欲的养生理论、治病于未然的防病观点等等方面的论述，都显著体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。同时《黄帝内经》中的医学理论还融合了阴阳家、儒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兵家等诸子之学，这种相容并蓄的方式也正反映了黄老著作的学术特点。

因此，《黄帝内经》的书名冠以“黄帝”，并不仅仅是崇古假托的一般现象，实际上表明《黄帝内经》的成书与道家有关。后来《道藏》将《黄帝内经》收录其中，无疑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。

2 《素问》

“素问”作为书名单独出现，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自序。张仲景在序中说：“乃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八十一难》、《阴阳大论》、《胎胪药录》，并平脉辨证，为《伤寒杂病论》合十六卷。”

关于《素问》的命名和成书年代，宋代林亿等校正唐代王冰《次注黄帝素问》的《新校正》中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，一是《素问》之名与太素有关，“素问”即“问素”。二是《素问》成书于汉代。

林亿等《新校正》中说：“按王氏不解所以名《素问》之义，及《素问》之名起于何代。按《隋书·经籍志》始有《素问》之名。《甲乙经》序，晋皇甫谧之文，已云《素问》论病精辨。王叔和，西晋人，撰《脉经》，云出《素问》。是则《素问》之名，著于《隋志》，上见于汉代也。自仲景已前，无文可见，莫得而知。据今世所存之书，则《素问》之名起汉世也。所以名《素问》之义，全元起有说云：‘素者，本也。问者，黄帝问岐伯也。方陈性情之源，五行之本，故曰《素问》。’元起虽有此解，义未甚明。按《乾凿度》云：‘夫有形者生于无形。故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。太易者，未见气也。太初者，气之始也。太始者，形之始也。太素者，质之始也。’气形质具而疴瘵由是萌生，故黄帝问此太素，质之始也。《素问》之名，义或由此。”

从《新校正》所作的考证来看，这两个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。所谓“问素”，日本丹波元胤在《中国医籍考》中说：“犹屈原有‘天问’，是倒置而下字尔。”“问素”即为“问太素”，“问太素”即为问疾病

与医理。隋唐时杨上善注《内经》而书名《黄帝内经太素》，亦可作为“问素”的佐证。

《乾凿度》属于《易纬》之一，而《易纬》则是汉儒解释《易经》的系列著作，根据《易纬》中载录的有关儒道两家以及孟京易学的资料，可以确定《易纬》的成书应该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，至少不会早于汉成帝之前。《易纬·乾凿度》上、下卷中都反复阐述的太易、太始、太初、太素等宇宙“四始”的概念，反映了汉代学者确立的从无形到有形、由元气生成万物的宇宙生成观。

太易、太始、太初、太素的范畴散见于《庄子》、《淮南子》和扬雄的《檄灵赋》、《太玄赋》等著作中。然而把太易、太始等作为宇宙“四始”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则始于《易纬·乾凿度》。托名战国时列御寇所作的《列子》中虽然载录了和《易纬·乾凿度》完全相同的“四始”内容，但《列子》的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都与先秦著作有别，属于魏晋人伪作已无疑义。除此之外，东汉章帝时班固的《白虎通义》和三国魏张揖所撰的《广雅》中均载录有和《易纬·乾凿度》相类似的文字，可以认为是对“四始”概念的补充。

《白虎通义·天地》中说：“天地者，元气始生，万物之祖。……起始，先有太初，然后有太始，形兆既成，名曰‘太素’。……故《乾凿度》云：‘太初者，气之始也。太始者，形之始也。太素者，质之始也。’”

《广雅·释天》中说：“太初，气之始也。生于酉仲，清浊未分也。太始，形之始也。生于戌仲，清者为精，浊者为形也。太素，质之始也。生于亥仲，已有素朴而未

散也。三气相接，至于子仲，剖判分离，轻清者上为天，重浊者下为地，中和为万物。”

《易纬·乾凿度》用“四始”的概念说明了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。有形生于无形，从无到有，由“未见气”到“气之始”，由“气之始”到“形之始”，由“形之始”到“质之始”，宇宙万物的发生经历了太易、太始、太初、太素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，至太素而万物化生。万物既生，人类亦在其中。人体气、形、质兼具，便会因气、形、质的变化而产生各种疾病。

《素问》阐述是人体的生命现象，并且是通过问答的方式来解释人体的生理活动、病理变化、疾病治疗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。因此引用《易纬·乾凿度》中有关宇宙生成论中的“太素”概念，以气、形、质俱备的“太素”作为人体的代名词。把“问太素”作为探究人体疾病发生发展和诊断治疗客观规律的形象表述，不仅可以确切规范《素问》的医书内涵，更显明表达了医家必须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探究生命之理的深刻含义。这样，宇宙自然的宏观和人体生命现象的微观在“素问”的名义下得到了理想的统一。

“素问”即“问素”，“问素”即“问太素”，从《素问》书名的命名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确立的宇宙生成论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影响，并且能够得出《素问》的汇集成书不会早于西汉晚期的明确结论。

3 《灵枢》

“灵枢”之名最早见于唐代王冰次注《素问》自序。王冰在《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》中说：“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‘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。’《素问》即其经之九

卷也，兼《灵枢》九卷，乃其数也。”

林亿等《新校正》注解说：“详王氏此说，盖本皇甫士安《甲乙经》之序。彼云：‘《七略》、《艺文志》，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。今有《针经》九卷，《素问》九卷，共十八卷，即《内经》也。’故王氏遵而用之。又《素问》外九卷汉张仲景及西晋王叔和《脉经》只谓之《九卷》；皇甫士安名为《针经》，亦专名《九卷》。杨玄操云：‘《黄帝内经》二帙，帙各九卷。’按《隋书·经籍志》谓之《九灵》，王冰谓之《灵枢》。”

这是说《黄帝内经》分为两部，一部即《素问》，另一部皇甫谧《针灸甲乙经》自序称作《针经》，而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自序称作《九卷》，王冰次注《素问》自序则称作《灵枢》，另外还有着《九灵》的别名。林亿等《新校正》认为《针经》、《九卷》、《灵枢》、《九灵》四书实为一书。

《灵枢》又称作《九墟》。林亿等曾引用《九墟》校正过《素问》、《针灸甲乙经》等医籍，对此，日本丹波原简《灵枢识》中说：“考亿等《素问》、《甲乙》等注所引《九墟》文，今并见本经中，乃知《九墟》者，乃此经之别本。……要之，曰《灵枢》、曰《九灵》、曰《九墟》，出黄冠所称，而《九卷》、《针经》乃为旧题也。”

“灵枢”的名称当出自道家，日本丹波原胤《中国医籍考》也有同样的观点：“今考《道藏》中有《玉枢》、《神枢》、《灵轴》等之经，而又收入是经，则《灵枢》之称，意出于羽流者欤？”

若《灵枢》、《针经》、《九卷》、《九灵》、《九墟》同为一书，则“灵枢”之名应属后起。因《针经》之名过于直露，《九卷》之名又偏于粗俗，和《九灵》、《九墟》相比，“灵

枢”的名称既语词典雅而又带有道家意味，体现了《黄帝内经》成书于秦汉之际并且与汉代盛行的黄老之学密切相关的学术特征。

按许慎《说文·玉部》：“灵，巫以玉事神。从玉，靈声。靈，或从巫。”“灵”的本义为巫奉玉舞蹈以降神，因此与神明有关。“枢”则指枢要。张介宾说：“神灵之枢要，是谓‘灵枢’。”（《类经·卷一·类经名义》）此言甚是。道家认为万物皆有神，而人最具神灵，以《灵枢》阐述医理，故称神灵之枢要。又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篇首有“昔有黄帝，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言，幼而徇齐，长而敦敏，成而登天”之句，《内经》系黄帝与诸臣问答医理之书，以神灵指代黄帝，显明《灵枢》为黄帝之学，义亦可通。

近人任应秋氏引陆心源之说而认为“灵枢”之名为王冰改作（任应秋《〈黄帝内经〉研究十讲》），立论颇觉牵强。王冰既称“幸遇真经，式为龟镜”、“昭彰圣旨，敷畅玄言”（均见王冰次注《素问》自序），对经文移简补遗每或有之，若妄改书名则于理不合。王冰所见《灵枢》或确为当时《内经》传世之古本。

《灵枢》虽属《内经》的一部份，但却长期失传，以至于后代医家往往不提《灵枢》而多《素》、《难》并称。晋代皇甫谧撰《针灸甲乙经》时曾取材于《针经》，王冰在注解《素问》时也大量引用过《灵枢》、《针经》的文字，然而二人曾经见过的《灵枢》、《针经》原本如今均已亡佚。林亿等校正《素问》、《甲乙经》时并未见到《针经》或《灵枢》的全本。北宋元祐八年高丽献《针经》而曾诏颁天下，此书随后亦已失传。直至南宋绍兴二十五年成都史崧献出《灵枢》家藏

旧本，增修音释并将九卷改为二十四卷，《灵枢》（亦称《灵枢经》）方才重现于世而流传至今。

历史上有着《灵枢》、《针经》同时并存的情形，因此对于《灵枢》和《针经》是否为同一本书后世也有着不同看法。王冰注《素问》常引用《针经》或《灵枢》，或二者并引之，如在《三部九候论》中注引《灵枢》文称《灵枢》，而在《调经论》中注引同一《灵枢》文则又称《针经》。故林亿等《新校正》说：“在彼云《灵枢》而此曰《针经》，则王氏之意，指《灵枢》为《针经》也”。南宋王应麟《玉海》引《中兴馆阁书目》云：“《黄帝灵枢经》九卷，黄帝、岐伯、雷公、少俞、伯高问答之语。隋杨上善序。凡八十一篇。《针经》大抵同，亦八十一篇。《针经》以《九针十二原》为首，《灵枢》以《精气》为首，又间有详略。”

这是把《灵枢》和《针经》看作内容大致相似而又有所不同的两部书。

按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“《黄帝素问》九卷”，“《黄帝针经》九卷”，“《黄帝素问》八卷，全元起注”。

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：“《黄帝针灸经》十二卷”，“《黄帝素问》八卷”，“《黄帝针经》十卷”，“《黄帝九灵经》十二卷，灵宝注”。

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：“《黄帝针灸经》十二卷”，“《黄帝针经》十卷”，“全元起注《黄帝素问》九卷”，“灵宝注《黄帝九灵经》十二卷”。

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：“《黄帝内经素问》二十四卷，唐王冰注”，“《素问》八卷，隋全元起注”，“《黄帝灵枢经》九卷”，“《黄帝针经》九卷”，“《黄帝九虚内经》五卷”。

从上述书目可以看出，《黄帝

素问》、《黄帝针经》、《黄帝针灸经》、《黄帝九灵经》、《黄帝灵枢经》和《黄帝九虚内经》都是不同的书。由于《黄帝针经》、《黄帝针灸经》、《黄帝九灵经》、《黄帝九虚内经》等都已失传，《灵枢》和《针经》之间的同与异也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

《灵枢》的书名与道家有关，而王冰号启玄子，又“弱龄慕道，夙好养生”（见王冰次注《素问》自序），在注释《素问》时曾径直将《上古天真论》、《四气调神大论》、《生气通天论》等明显带有道家养生思想色彩的篇章移于《素问》卷首，这些都表明王冰实际上是属于道家的人物。旨在强调《黄帝内经》是道家的著作，也许这便是王冰把《灵枢》而不是把《针经》与《素问》合称为《黄帝内经》的根本原因。

中医名家

中医史上第一位女灸学家——鲍姑

鲍姑是晋代著名炼丹术家、精通灸法，也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位女灸学家。相传她是晋代广东南海太守鲍靓之女，医家葛洪之妻，以专治赘瘤和赘疣而闻名于时，以艾线灸人身之赘瘤，一灼即消，疗效显著。她长期与丈夫葛洪在广州罗浮山炼丹行医，岭南人民尊称她为“鲍仙姑”。

鲍姑行医采药，其足迹遍及广州、南海、惠阳、博罗等地。她医术精良，擅长灸法。她是采用越秀山脚下漫山遍野生长的红脚艾绒进行灸疗治病，因此，后人称此艾为“鲍姑艾”。曾有诗赞颂：“越井岗头云作岭，枣花帘子隔嶙峋。我来乞取三年艾，一灼回应万古春。”

一天，鲍姑在行医采药回归途中，见一位年轻姑娘在河边照容，边照边淌泪。鲍姑上前一看，见她脸上长了许多黑褐色的赘瘤，十分难看。乡亲们因此都鄙视她，亦无法找到男人，故而顾影自泣。鲍姑问清缘由，即从药囊中取出红脚艾，搓成艾绒，用火点燃，轻轻地在姑娘脸上熏灼。不久，姑娘脸上的疙瘩全部脱落，看不到一点疤痕，变成了一个美貌的少女。她千恩万谢，欢喜而去。

鲍姑死后，岭南人民为了纪念她对医学事业的重大贡献，在广州越秀山下三元宫内修建了鲍姑祠，以志纪念。遗憾的是，鲍姑没有留下什么著作，后人认为，她的灸法经验可能渗入到葛洪的《肘后备急方》中。该书有针灸医方 109 条，其中灸方竟占 90 余条，并对灸法的作用、效果、操作方法、注意事项等都有较全面的论述。据分析，葛洪不擅长灸法，他的精力主要集中于炼丹和养生上。《肘后备急方》中收入如此丰富的灸方，可能与擅长灸法的鲍姑有密切的关系。